

安徒生和他的《柳树下的梦》

■袁念琪

村人到教堂去做礼拜,发现路旁坐着一个手艺人。他已经死了,在这棵柳树下冻死了。

这是安徒生《柳树下的梦》(又译《在柳树下》)的结尾。他说这部写于1853年的作品是童话,但也有人把它看作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

安徒生故居是平房,屋小低矮、门窗粗糙,高个进门要低头;整个建筑是19世纪初的模样。当时,这里是贫民区,居住着最底层的码头工人、靠吃救济的人和乞丐。实际上,真正的故居只是其中窄小的一间,住着他家五口人。后来为了建馆,搬迁左邻右舍,屋内打通。

故居不远处是大而现代的安徒生博物馆,有18个展室,最大的是1930年建的环形大厅。八幅大型壁画环绕一圈,展现安徒生一生的重要片段;起终点皆是欧登塞。作者是丹麦著名艺术家斯蒂文。

馆内陈列着某女子的照片和她与安徒生往来的书信。据说,这是安徒生一见钟情的女人,却早已订婚。他保存了女子的信,却被为他打理事物的柯林烧了;那女子也保存了安徒生的信,直到死后才被发现。我猜这个女子是里玻格。安徒生与她在

同学沃伊格特父亲家相见,爱情第一次涌动。他写道:“我只有一个思想,那就是她——但是,等待我的只是失望。她爱另外一个人——她和他结了婚。”

而最令安徒生刻骨铭心的,是被誉为“夜莺”的著名瑞典女歌星詹妮·林德,他苦恋她14年未果。

第一次见面在1840年的哥本哈根,安徒生说:“那时我已经知道她是斯德哥尔摩的顶尖歌唱家。”三年后,女歌星又来;她与安徒生的朋友、芭蕾舞大师布农维尔的妻子是朋友,已读安徒生作品的她想再见作家。到1845年见面时,安徒生说:“她的才华随着名声的光辉进入每个人的眼里,人们真是整夜在剧院前面排队以求买到一张门票。”林德在哥本哈根期间,安徒生每天去她住的布农维尔家。得知她要去柏林演出,安徒生暗暗打算:“那是我很长很长时间向往的事情,所以圣诞节的时间,我要待在柏林。”

圣诞夜,安徒生婉拒了朋友们的邀请,一心等林德来邀,最后落空。他在《我的童话人生》里写道:“我非常孤独地坐在旅馆里,感觉被遗弃;我打开窗子,仰望望着星空,那是我的圣诞树;我的思想受到很大伤害。”事后,林

德做了弥补,和女伴、安徒生三人再过节。林德为安徒生装点圣诞树,树上礼物全归他,但还是坚持以兄妹相称。

安徒生的《柳树下的梦》,写了鞋匠克努得和歌星约翰妮的故事。与他这个鞋匠和洗衣妇的儿子不同,克努得与约翰妮从小是邻居,儿时,他们喜欢在柳树下玩。后来约翰妮家迁京城,又签约歌剧院;克努得则做了鞋匠学徒。他19岁一满师就去哥本哈根找17岁的约翰妮,一心想给她买戒指。约翰妮家“是一种富足的样子”,她为他倒茶,唱歌,紧握他的手。

此后,克努得每晚都走到约翰妮屋外,见她人映窗帘就觉得“这真是最可爱的一晚!”他本来准备礼拜天摊牌,到了那天却没找到机会,他们一家要外出。他又去她家,约翰妮一人在,他感到“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幸运的事情”。他表白自己怎样始终爱她,要她一定做他的妻子。约翰妮严肃地回答:“我将永远是你的一个好妹妹。”

几年后,克努得在米兰一大歌剧院见到台上的约翰妮,掌声如潮,谢幕不停。人们簇拥她的车到家,一位胸戴星章的绅士扶着她;大家说,他们订婚了。

克努得决定回到老家那棵

柳树下。归途中,疲倦的他坐在异国的柳树下,在严冬夜睡着了,他梦见与约翰妮挽手走向教堂……被冰雹打醒的他说,“这是我生命中最甜美的一個時刻!”接着他又睡去。下雪了,他在梦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安徒生很在意这部作品。他一见纽伦堡就说《柳树下的梦》“描写了那座美丽的古老城市”,而在老天鹅堡的时候,他还向巴伐利亚马克斯国王和王后朗读了这个梦。

身高1.85米的安徒生一生未娶。据安徒生博物馆介绍:“没有爱情青睐他,也没有家庭生活,他的艺术成就使他在哥本哈根上

流社会中获得一席之地,但他仍没有足以支持他结婚的经济来源。”甚至好几次他卖掉王公们赠送的胸针和金戒指,直到逝世都没自己的产权房,最后借住的是犹太富商梅尔彻尔的房子。

我住的安徒生丽笙酒店,门口有棵高大的银杏,座椅绕树围成半圆,安徒生坐像占了三分之一。安徒生肩头的大披风右边拖地,左边遮盖了椅子足有两人的位置,脚边的地下放着手提包。秋深了,金黄的杏叶散落一地,有些落在了安徒生的披风上。



树下的安徒生像

女兵作家谢冰莹在上海的岁月

■陈 虹

谢冰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位女兵作家,其父是晚清举人,能文能诗,任新化县立中学校长37年。谢冰莹颇具才华,早年与陈天华、成仿吾被誉为新化“三才子”。作为经受北伐战火洗礼的女兵,她的成名作《从军日记》1927年陆续发表于《中央日报》副刊,深得主笔孙伏园及林语堂的赏识。

北伐革命失败后,女兵队解散,女兵生活戛然而止,回湘所遇又极度失望,1928年,不甘沉沦、追求自由的谢冰莹决意离开湖南,取道汉口乘船到上海。

在上海亭子间过着清苦生活的谢冰莹,有一天从翻译家汪德耀手里接到一封由法国寄来的信,从里到外满是法文,原来是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发来的信函,大意是:“……从汪德耀先生译的《从军日记》里面,我认识了你,年轻而勇敢的中国朋友,你是一个努力奋斗的新女性,你虽然像一只折了翅膀的小鸟,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冲出云围,翱翔于太空之上的。朋友,记着,不要悲哀,不要消极,不要失望,人类终究是光明的,我们终会得到自由的。”(《谢冰莹集》,马蹄疾、陈漱渝编,知识出版社1997年出版。)这封信给了谢冰莹很大的鼓励。

1928年秋,在一次作家聚会上,谢冰莹结识了郁达夫、王映霞夫妇及张资平等。此后不几日,她出于“想多知道一些作家写作的经验,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及写作环境”,终于一个人鼓着勇气去拜访郁达夫先生,在法租界赫德路(今常德路)郁

达夫寓所受到主人的热情接待,边交谈边饮酒甚是投缘。那段时期,孙伏园办了一个综合性刊物《贡献月刊》,社址就在他家——哈同路(今铜仁路)民厚南里嚶嚶书屋,谢冰莹常常在周末去探访,告别时总会带走几本刚问世的文艺刊物。

出于对谢冰莹文学才能的怜惜,孙伏园建议她考大学,由他承担膳费和书费。但素来主张自食其力的谢冰莹,打算先解决生计问题,即使当工人、保姆也成,等到有积蓄后再深造。就在她为找工作陷入苦闷而徘徊时,得知此事的钱杏邨(阿英)告诉她:“这学校的教务主任,还有好几位教授,也都是文化界有名的革命者,你是女兵,进去可以免收学费;至于膳费和书费,可以靠卖点文章来补助。”经由阿英的介绍,谢冰莹考入上海艺术大学中国文学系二年级,借宿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014弄,同时入学的还有她中学时的好友王克勤,即后来一度成为电影明星的王莹。最窘迫时,谢冰莹竟然连续四天无食可进,饿得实在熬不住,便找约定出版《从军日记》的春潮书店夏康农借钱。

谢冰莹就读的上海艺大因学潮招致当局的粗暴干预,曾被解散过的学校再次封闭,她原本以为至少能安然读两年书的愿望,结果不到半年就破灭了。1929年春,正发愁出路的谢冰莹,收到一封由孙伏园代转的三哥的信,里面附有一张30元汇票,劝其去北平投考女师大。于是,她登上了开往天津的海船。

历经种种磨砺,1931年谢冰莹再度辗转来到上海。仲夏,她置身江湾幽静的房子里,不停地构思小说里的人物,废寝忘食地写作。谢冰莹的文学创作始终充满呼唤女性觉醒、抗争、自立的精神。《抛弃》就是这样一篇以1931年春上海为背景的短篇小说,描写的是一位外来女工因经济困顿最终不得不抛弃自己亲生女婴的悲苦故事。

文思敏捷,焚膏继晷,天资加勤奋的谢冰莹一天能写13000字,仅用了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青年王国才》和《青年书信》两部书稿。《青年王国才》是她生平第一次用第三人称写的长篇小说。“在动笔以前,并没有写出大纲和人物表来,只把整个结构大略在脑子里构思了一下,以中学生为题材,内容描写一个好出风头,谈恋爱的学生,和一个埋头苦读的学生,两种不同的生活。人物是我从教过的学生里面挑出来的,把好几个人的优点,集中在王以仁的身上;把好几个人的缺点,加到王国才和女主角梅英的身上,就这样,我不分昼夜地埋头写作,不吃饭,不睡觉。有时买几个面包来放在桌子上,饿了,左手拿着面包啃,右手仍然在写字;晚上,实在写累了,和衣往床上一倒,老鼠成群结队地跑来把面包拖走了也不知道……”(《作家的足迹》,阎纯德著,知识出版社1983年出版。)这两部书很快顺利出版,使她总共拿到了650元稿费,这在当时可算得上一笔巨款。于是,谢冰莹决定用这笔钱去日本留学,完成梦寐以求的读书夙愿。

1931年7月20日,谢冰莹乘船启程去长崎。不久,“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国难耻辱令其悲愤不已,入学东京早稻田大学后,即和许多留日学生一起参加爱国抗日活动,与镇压的军警发生冲突,是年底被遣送回国。不久,“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谢冰莹随即加入著作者抗敌协会,白天参加医院组织的救护队工作,晚上写稿,编辑《妇女之光》周刊,还动员了300多名各界妇女加入支援抗战行列。由于法租界当局强令宣传抗日的刊物停刊,谢冰莹随后离开上海去往福建。

1933年11月底,谢冰莹被卷进“闽变”政治漩涡,离闽至上海避风头。在拜访柳亚子时,柳公当即相劝,《申报》已公布包含她在内的通缉名单,还是赶紧回故乡湖南躲避为妥。于是,她匆匆告别上海,隐居长沙妙高峰青山祠,但文学创作方面与上海的联系却未中断,应当时正在良友图书公司主编中国文学丛书的赵家璧之约,闭门写作《一个女兵的自传》。此书1936年3月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后,迅即轰动文坛蜚声中外,后被翻译成英、日、法、德、西、葡、意等文字。

1936年夏,二赴日本留学屡遭迫害最终逃脱牢狱的谢冰莹悄悄从东京返回上海,随即取道香港前往桂林。1948年9月,谢冰莹应聘去台湾师范学院(台湾师范大学前身)任教授,途经上海,临行前特意去钱君匋办的万叶书店购买一批童书,托人带给远在北平的湘儿,从此漂泊海外,浪迹天涯。